

语言景观视角下中亚城市公共标识的多语现象分析

——以塔什干国际机场为例

邓凯月

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2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15日

摘要

本研究以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城市公共标识牌为研究对象, 基于语言景观理论框架, 通过对塔什干市内及国际机场等关键交通枢纽标识的实证分析, 探究语言种类、层级排序、出现频率及语言规范程度等特征。研究发现, 塔什干语言景观呈现多层级符号权力结构: 乌兹别克语作为国语具有法律与象征层面的最高权威; 俄语凭借历史积淀在公共交际与商业领域仍具有重要作用; 英语作为全球化语言是国际旅游与商业的通用媒介; 中文则作为新兴且具有明确指向性的语言符号, 展现出显著的战略性与功能性特征。针对塔什干机场等场所中文标识的兴起现象, 研究表明其直接驱动因素为中乌两国在基础设施、航空及旅游领域的深度互联互通。中文标识的植入是乌兹别克斯坦为对接中国资本、游客及项目人员实施的主动性语言服务与城市管理策略, 是区域合作深化过程中社会经济活动增强的语言符号映射。公共空间的语言选择是重要的社会实践, 塔什干语言景观的变迁反映了全球区域及国家力量在本地空间的博弈与交融。中文标识的兴起是区域合作影响中亚语言生态与社会空间的微观体现, 为理解宏观政策对地方实践的作用提供了实证案例。

关键词

语言景观, 区域合作, 公共标识语言现象, 塔什干

A Study on Multilingual Phenomena of Public Signs in Central Asian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 Landscape

—A Case Study of Tashkent International Airport

Kaiyue Deng

文章引用: 邓凯月. 语言景观视角下中亚城市公共标识的多语现象分析[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10): 172-181.

DOI: 10.12677/ml.2026.1410980

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urban public signs in Tashkent, the capital of Uzbekista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linguistic landscape, through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signs in key transportation hubs such as downtown Tashkent and its international airport, the study explores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language types, hierarchical order,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and degree of language standardization.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ashkent's linguistic landscape presents a multi-level symbolic power structure: Uzbek, as the national language, holds the highest authority in legal and symbolic terms; Russian, relying on its historical legacy, still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public communication and commercial sectors;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serves as a common medium for international tourism and business; and Chinese, as an emerging linguistic symbol with clear orientation, demonstrates distinct strategic and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Regarding the rise of Chinese signs in locations like Tashkent Airport,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direct driving factor is the in-depth connectivity between China and Uzbekistan in infrastructure, aviation, and tourism sectors under bilateral cooperation. The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signs is a proactive language service and urban management strategy adopted by Uzbekistan to connect with Chinese capital, tourists, and project personnel, and it also represents a linguistic symbolic reflection of the enhanced socio-economic activities during the deepening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Language choice in public spaces constitutes a significant social practice. The changes in Tashkent's linguistic landscape reflect the competition and integration of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forces in local spaces. The rise of Chinese signs is a microcosmic manifestation of how regional cooperation influences the linguistic ecology and social space in Central Asia, providing an empirical case for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macro-policies on local practices.

Keywords

Linguistic Landscape, Regional Cooperation, Linguistic Phenomena of Public Signs, Tashkent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区域合作倡议的深入推进深刻影响着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文化生活。语言作为文化交流与经贸往来的基础媒介,其使用状况成为观测这一宏大进程的独特窗口。公共空间中的书面标识——“语言景观”,则直观反映了一个地区的语言政策、权力关系以及全球化与本地化的互动。

乌兹别克斯坦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国家,也是区域共建中的关键伙伴。其首都塔什干的国际机场,作为国家跨文化接触的重点场所,其语言景观的变迁具有显著的研究价值。近年来,塔什干机场公共标识语的语种除了乌兹别克语和英语俄语,还出现了中文,这种多语格局呈现出的特征值得深入探讨:中文标识的兴起与区域合作倡议存在何种关联?其背后折射出的社会文化变迁又是怎样的?

为此,本研究将以塔什干国际机场的公共标识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语言景观理论,通过实证调查,

旨在系统描述其多语使用现状，深入剖析中文标识的功能与动因，从微观层面解读区域合作对中亚社会文化生态产生的深远影响，为中亚和中国的跨文化交际提供一种特殊的视角。

2. 研究背景

近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持续深化，双边与多边框架下的经贸往来、基础设施建设与人文交流日益频繁。以乌兹别克斯坦为例，中乌两国在能源、交通、农业等领域的合作项目不断落地，直达航班数量增加，中国赴乌游客、商务人士及项目工作人员数量显著增长。这种日益紧密的互联互通，必然对语言服务产生巨大需求。

塔什干国际机场作为乌兹别克斯坦的主要门户和连接中乌人员往来的重要枢纽，其语言环境必须适应这一新的现实。公共标识作为语言服务的直接载体，其语种选择与呈现方式不仅关乎旅客通行效率，更折射出国家语言政策、社会语言态度及跨国合作的实际影响。因此，考察塔什干机场的语言景观，实质上是观察区域合作如何具体而微地嵌入并改变沿线国家公共空间与日常生活的一个典型案例。

3. 文献综述

3.1.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语言景观研究虽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较快。陈睿对语言景观研究热点的多维取向进行了梳理[1]。在理论引介方面，方小兵译介了杜克·戈特的西方语言景观研究学术简史，为国内学界提供了学术脉络参照[2]。葛俊丽从语言与空间的关系出发，探讨了语言景观研究的空间视角[3]。尚国文与赵守辉在分析维度与理论构建方面提出了系统框架[4]，并进一步阐述了语言景观研究的视角、理论与方法[5]。研究对象也从典型公共标识拓展至非典型语言景观[6]。在应用领域，旅游语境中的语言景观展现出宏观社会语言学价值[7]，语言景观亦可作为语言教学资源与工具[8]。针对中亚地区，田烨和于梦杰分析了国家政策对语言格局的影响[9]。张怡名则以安阳景区为例，从跨文化传播视域考察了语言景观[10]。

3.2. 国际研究发展

国际学界对语言景观的研究起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并逐步成为多语研究的新路径。早期 Rosenbaun 对耶路撒冷商业街区语言使用的调查、Spolsky 与 Cooper 对街道标牌多语状况的考察积累了经验基础。在应用层面，Cenoz 和 Gorter 发现语言景观可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附加输入来源[11]。Coluzzi 对意大利米兰和乌迪内的语言景观进行了个案比较[12]。Gorter 在专题导论中指出，语言景观研究是考察多语现象的新路径[13]。经典定义由 Landry 和 Bourhis 提出：公共路牌、广告牌、街道名称、地名、商铺招牌及政府建筑等公共标志上呈现的多种语言，共同构成了某一特定地域、区域或城市集群的语言景观[14]。Scollon 和 Scollon 则强调语言与物质空间的互动，提出场所话语分析框架[15]。在此基础上，Spolsky 提出了公共标识语言选择的三个基本条件：呈现条件、效率条件和象征价值条件[16]。

目前，国内关于语言景观的研究方兴未艾，但多集中于东南亚、西欧等地，对中亚地区的系统性研究尚显不足。少数研究提及中亚地区的对外汉语传播，但多从语言教学或政策视角出发，缺乏从语言景观理论入手，对公共空间标识进行微观实证分析的成果。

本文将语言景观理论应用于中亚枢纽机场这一特定场域，重点分析中文作为新兴变量，如何嵌入并改变原有的多语生态，从而为区域语言研究提供新的实证支持。

3.3. 语言景观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价值与应用

在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下，语言景观作为重要的文化接口，不仅为跨文化群体理解与接纳对象国文化提供了媒介，也以其可视化的形态承载着语言特征、群体身份、历史传统与价值观念等多重文化要素。

在传递实用信息的同时，语言景观也实现了文化意义的传递与重构。总的来看，其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于以下两点：

优化旅游体验与塑造国家形象。对于国际游客而言，清晰、准确的多语标识是其感知目的地文化氛围、服务水准与友好程度的重要依据。因此，对语言景观进行研究与优化，是改善国际旅游体验、塑造正面国家形象的有效途径。同时，语言景观作为公共空间的名片，直接映射出地区的语言政策与社会语言态度，为相关政策的评估与制定提供了现实参照。

促进跨文化理解与社会融入。合理的语言景观规划能有效降低沟通障碍，提升信息的可及性，帮助游客、留学生等跨文化群体更顺畅地获取关键信息，适应本地环境。更重要的是，语言景观是文化身份与权力关系的视觉表征。对多元语言的尊重与呈现，本身即是一种包容的姿态，有助于增进不同文化群体间的理解与尊重，推动共建基础上的文化认同。

本研究正是基于上述理论认知，将塔什干机场这一特定场域作为观察案例，具体探究语言景观如何实际发挥其跨文化传播功能。

4. 研究目的及意义

4.1. 研究目的

本研究通过对塔什干机场及周边区域各类标识牌的实地观察与记录，掌握多语使用的现状与特征。重点分析中文标识的功能特点、空间分布及其语言形式，为后续研究建立一定实证基础。

此外，研究将重点关注中文标识的兴起与中乌两国在经贸、旅游、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化的内在关联，揭示宏观政策对微观语言实践的影响机制。同时通过分析不同语言在公共空间中的呈现方式与层级关系，探讨乌兹别克斯坦在身份构建、历史传承与国际化进程中的复杂考量。

4.2. 研究意义

理论层面，本研究将语言景观理论应用于中亚地区的特定场域，有助于拓展语言景观理论的适用范围和解释维度，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点，丰富了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内涵。

实践层面，本研究对塔什干机场多语标识的考察结果，可为乌方改进机场及城市公共标识的中文翻译质量、规范多语排版提供直接参考，降低中国旅客的出行障碍。同时，研究结论也有助于中方了解乌兹别克斯坦公共空间语言服务的实际状况，为相关机构在旅游推广、投资服务及人员往来中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语言支持策略。

5. 研究方法

为实现研究目的，本研究采用抽样调查法。主要语料来源为自媒体用户公开发布的塔什干机场标识照片，并在此基础上，采用目的性抽样原则，筛选出包含清晰多语信息(尤其抽取含中文的标识)约 30 余张标识牌照片作为样本，确保覆盖不同功能区域，如出发大厅、抵达通道、安检区、商业区等。

6. 实例分析与解读

6.1.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重分析框架

在展开具体分析之前，有必要引入语言景观研究中标识分类的基本框架。依据标识设立主体的不同，公共空间中的语言景观通常被划分为两类[4]：一类是“自上而下”的官方标识，由政府部门或相关机构设置，体现国家语言政策和官方意识形态，如机场方位指示牌、功能设施标识等；另一类是“自下而上”的商业标识，由商业企业或私人组织设置，更多反映市场需求与商业逻辑[4]，如投资广告、商铺招牌等。

两类标识背后不同的逻辑，构成了理解塔什干语言景观多语现象的重要分析维度。本研究所采集的样本中，既有官方标识，也有商业标识。



Figure 1. Airport directional sign

图 1. 机场方位指示牌



Figure 2. Green channel sign

图 2. 绿色通道指示牌



Figure 3. "Information" sign

图 3. “信息”标识



Figure 4. “Passport control” sign

图 4. “护照检查”标识

以上标识语言的丰富程度可见其对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且都清晰地展示了一个稳定的语言排序：乌兹别克语 > 俄语/英语 > 中文。

图 1~3 所呈现的标识均属于“自上而下”的官方标识，由机场管理方或相关政府部门设置。其语言选择首先满足象征价值条件：乌兹别克语作为独立后主权国家的国语，被置于排版的首位(顶部或最左侧)，字体也最为显眼(图 3)，彰显国家身份与语言主权。

俄语与英语的排序在不同标识中有所波动。图 1 和图 2 中俄语居第二位、英语居第三位，而在图 3 中英语替代了俄语的位置。这种波动体现了效率条件要求以最经济有效的方式传达信息[16]。英语作为国际航空通用语言，能够覆盖最广泛的国际旅客群体；而象征价值条件则涉及标识制作者希望被识别的身份认同，俄语的选择承载着苏联时期遗留的历史通用语身份，也反映了乌兹别克斯坦与俄语世界仍存在的经济与人文联系。英语在部分标识中代替俄语的现象，可能反映了乌兹别克斯坦在语言政策调整中试图平衡历史遗产与国际化需求[9]。

中文的出现首先服务于呈现条件，用中国旅客能够理解的语言提供信息。但其在视觉层级中的末位位置也表明，象征价值条件在此处的权重有限：中文更多地作为一种功能性补充，服务于中文母语者这一特定的群体。绿色通道指示牌(图 2)将乌兹别克语、俄语、英语和中文以从上至下的空间位置清晰排列。其中乌兹别克语、俄语和英语出现在同一个指示牌，中文部分单独占据一个指示牌并置于下方，护照检查处(图 4)也是类似的配置，这种排版方式进一步印证了中文作为后期补充的推测。

6.2. 中文标识的分类与功能定位

根据功能与内容，塔什干机场的中文标识可分为以下三类：

1. 导航指示类标识

这类标识旨在为旅客提供最基础的空间导向功能。其最显著的特点是翻译上的直接性与功能至上。



Figure 5. Airport arrival hall directional sign

图 5. 机场抵达通道方向标识



Figure 6. “To the City” navigation sign
图 6. “进城”导航标识

机场抵达通道方向标识(图 5)的中文翻译采用直译的方式,配合图标方便游客理解。当然,类似的直译也会出现一些瑕疵,如图 5 的“转”、“到达大”,图 6 的“进城”这些翻译生动反映了本地化过程中的初始阶段特征。虽是略显生涩的直译,但其核心信息基本传递到位。从语言选择条件来看,这类标识的制作者优先满足了呈现条件,即用目标读者能够理解的语言传递核心信息。而效率条件(即翻译的提炼与规范)则相对处于次要位置[16]。这种不完美的翻译,从侧面推测可能反映了机场管理方在引入中文标识时较为迫切的实际需求,但翻译审核环节或许尚不够精细,这一判断有待进一步通过访谈机场管理人员或翻译服务提供者等质性方法加以验证。

2. 功能设施类标识



Figure 7. Airport functional area sign
图 7. 机场功能分区标识



Figure 8. Security check area sign
图 8. 安检区标识

在以上功能设施标识中,中文翻译呈现出高度的准确性与规范性,例如图 7 “卫生间”、“急救”、

“祈祷室”，图8“登机手续”等译法完全符合中国大陆的通用标准，语义清晰，无歧义。此类标识同时在呈现条件和效率条件上达到了较高水准：目标读者能够准确理解信息，且信息以精炼、规范的方式传达。这种规范化处理表明，此类标识的翻译过程可能经过了更严格的审核或由更专业的语言服务团队完成，质量已与国际通行的英语翻译看齐。

这类标识的中文与乌兹别克语、俄语或英语实现了稳定的并列呈现，构成了一种标准化的多语模板。这种固定的多语组合模式标志着中文已从一种为应对临时需求而设置的补充性语言服务，升级为塔什干机场不可或缺的官方语言之一，将中国旅客群体从众多国际旅客中清晰地识别出来，并将其提升至与俄语区旅客、英语区旅客同等重要的地位。换言之，此类标识的语言选择已不仅服务于呈现条件和效率条件，也开始承载象征价值。通过中文的标准化呈现，标识制作者(乌兹别克斯坦方面)希望被识别为“一个对中国旅客友好、专业的目的地”。见微知著，乌兹别克斯坦已将中国视为其旅游业发展及国际交往的重要市场与长期伙伴，通过营造友好、便利的语言环境，持续吸引并服务好中文母语及使用者。

3. 商业投资类广告标识



Figure 9. Free trade zone Ad (Blue)

图9. 自由贸易特区广告(蓝)



Figure 10. Free trade zone Ad (White)

图10. 自由贸易特区广告(白)

商业投资类广告标识与前述官方标识和功能设施类标识在设立主体上存在本质差异，它们属于“自下而上”的商业标识，由商业企业设置，更多体现市场逻辑与商业诉求[4]。从 Spolsky (2009)的三条条件理

论来看, 此类标识的语言选择体现了与官方标识不同的权重分配[16]。

首先, 呈现条件在此类标识中依然成立, 中文翻译使中国投资者能够理解项目信息。但呈现条件的内容更为丰富: 见图 9, 译文采用“乌中明源丝路自由贸易特区”这一名称, 其中“丝路”一词带有很强的历史文化辨识度, 既能唤起中国投资者对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记忆, 也将项目置于更宏大的政策叙事框架之中。标识特意用中文注明“国家级园区”, 通过官方身份的标注,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国投资者对项目资质的疑虑。

其次, 象征价值条件在商业标识中占据了更为突出的位置。标识制作者选择中文, 不仅是为了让目标读者读懂, 更是为了表达“希望被识别为与中国投资者对话的伙伴”这一身份认同, 文案设计充分考虑了中国受众的接受习惯。“至诚至信合作双赢”这句中文标语, 与中国商业文化中看重诚信的传统比较契合, 降低了合作初期的信任障碍。同时, 图 10 标识直接标注中国手机号码(+86)和微信官方页面, 使其不再是单纯的信息展示, 而是主动向中国投资者发出邀请。从象征价值条件的角度来看, 中文的使用在此处承载了明确的商业身份构建功能。

7. 结论

本研究以塔什干国际机场的公共标识为对象, 考察了该区域语言景观多语使用的实际情况。从收集到的标识来看, 机场的语言排列基本形成了固定模式: 乌兹别克语居首, 俄语和英语位置相对灵活, 中文通常排在最后。这种排序说明乌兹别克语作为国家语言的地位最为突出, 俄语主要承担历史通用语的功能, 英语是国际交流中的常用语言, 中文则是近几年新增的语言服务内容。

中文标识在塔什干机场的引入具有明确的功能导向与战略意图。出现频率、分布范围及语言规范程度均与中乌两国合作密切相关。从导航指示的实用翻译, 到功能设施的标准化翻译, 再到商业广告的文化适配, 中文标识从补充性服务发展为标准化的语言组成部分。这种转变体现了语言服务的升级, 更是乌兹别克斯坦积极吸引中国投资、人员与合作的体现, 显示其对中国合作角色的高度认可。

塔什干机场语言景观的演变是区域合作倡议在地方层面落地的一个微观视角。中文标识的嵌入提升了跨境流动的便利性, 也在语言符号层面影响着中亚城市的跨文化交往空间。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 样本来源主要依赖自媒体平台用户公开发布的标识照片, 而非研究者实地采集, 样本的代表性和覆盖度可能受到一定影响。其次, 样本数量有限(约 20 余张), 且局限于塔什干国际机场这一特定场域, 研究结论的外推效度有待进一步检验。第三, 本研究主要基于标识文本的视觉分析, 缺乏对标识制作者、管理者和使用者(如机场管理人员、中国旅客)的访谈数据, 对语言选择背后行动者意图的解读尚属推测性质。未来研究可通过田野调查扩充样本范围, 并结合访谈、参与式观察等质性方法, 进一步验证和深化本研究的发现。

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为理解中乌两国合作在社会文化层面产生的影响提供了具体案例,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至其他中亚节点城市或不同类型的公共空间, 以更全面把握区域语言景观格局的演变趋势。

参考文献

- [1] 陈睿. 论语言景观研究热点的多维取向[J]. 江淮论坛, 2021(6): 187-192.
- [2] 杜克·戈特, 方小兵. 西方语言景观研究学术简史[J]. 语言战略研究, 2020, 5(4): 13-22.
- [3] 葛俊丽. 语言与空间: 语言景观研究视角[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6, 38(4): 68-80+134.
- [4] 尚国文, 赵守辉. 语言景观的分析维度与理论构建[J].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4, 37(6): 81-89.
- [5] 尚国文, 赵守辉. 语言景观研究的视角、理论与方法[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4, 46(2): 214-223+320.
- [6] 尚国文, 周先武. 非典型语言景观的类型、特征及研究视角[J]. 语言战略研究, 2020, 5(4): 37-47+60.

-
- [7] 尚国文. 宏观社会语言学视域下的旅游语言景观研究[J].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8(3): 46-56.
- [8] 尚国文. 语言景观与语言教学: 从资源到工具[J]. 语言战略研究, 2017, 2(2): 11-19.
- [9] 田烨, 于梦杰. 中亚地区“去俄罗斯化”政策[J]. 国际研究参考, 2021(6): 7-22.
- [10] 张怡名. 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的语言景观研究——以安阳市旅游景区为例[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24.
- [11] Cenoz, J. and Gorter, D. (2008)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as an Additional Source of Inpu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RAL—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46**, 267-287. <https://doi.org/10.1515/iral.2008.012>
- [12] Coluzzi, P. (2009) The Italian Linguistic Landscape: The Cases of Milan and Udi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 **6**, 298-312. <https://doi.org/10.1080/14790710902935930>
- [13] Gorter, D. (2006) Introduction: The Study of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as a New Approach to Multilingu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 **3**, 1-6. <https://doi.org/10.1080/14790710608668382>
- [14] Landry, R. and Bourhis, R.Y. (1997) Linguistic Landscape and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16**, 23-49. <https://doi.org/10.1177/0261927x970161002>
- [15] Scollon, R. and Scollon, S.W. (2003) *Discourses in Place: Language in the Material World*.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0203422724>
- [16] Spolsky, B. (2009) Prolegomena to a Sociolinguistic Theory of Public Signage. In: Shohamy, E. and Gorter, D., Eds., *Linguistic Landscape: Expanding the Scenery*, Routledge, 25-39.